

治鉴 资通

司马光编纂 第一册



岳麓书社



资治通鉴

(第一册)

司马光／编纂

岳麓书社

出版说明

《资治通鉴》是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共 294 卷，起于战国三家分晋，讫于五代之末，记述了其间 1362 年的重大史事。它以其“资治”，给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其史料之详实、编纂之工整，又为后代史学家所青睐，因而长盛不衰，一版再版。我们整理出版《资治通鉴》原文本，也可以说是普及本，目的即在于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价廉而又较好的阅读原本。

这次整理，我们是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为底本的。这个宋刊本在内容上与胡三省的音注本有不少相异之处。据我们粗略统计，其相异处文字在万字以上，胡注本关系史事较大的脱文五千多字。因此我们认为出版这个宋刊本是有意义的。吕叔湘先生在其《〈通鉴〉标点琐议》一文中说到胡注本正文有几处无从标点的情况时举了三条例子后说：“如果选用一个好本子做底本，比如用涵芬楼即四部丛刊的本子，再用别的本子校，…就不会有（或很少有）这种无从标点的情况。上面三条，如果用涵芬楼本做底本，标点都不成问题，并且连校记也不用写。”我们所采用的底本，就是吕先生所说的涵芬楼即四部丛刊的本子。

我们在校勘、标点中，除了参看著者引用的正史外，还参照了其它版本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其中吸收中华书局的胡注校点本成果尤多。在校勘中，凡底本讹误衍漏据别本改正者，用〔 〕表示，而底本讹误、衍字则用（ ）标出。由于我们的水平和力量很有限，整理过程中的差错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指出，以便我们在重版时改正。

序 言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开始，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止，共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是我国编年史书记述时间最长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它的作者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仁宗时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至哲宗即位，作了几个月的宰相，元祐元年（1086）卒，年六十八岁，赠太师温国公，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他的事迹见《宋史》卷 336。

他不但是政治家、史学家，而且他在经济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有重要的主张和实践活动。他的文章朴实无华，被后人列为唐宋的大家之一。他最初是编写了从战国到秦的八卷编年史，进呈给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让他继续写下去，并为他在秘阁设置了书局，协助修书。这是他撰写《通鉴》的开始。当时尚无书名。两年后神宗即位（1068），神宗名其书为《资治通鉴》，并为此书做了序文。后来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便离开朝廷，带着书局，住到洛阳著书。到元丰七年（1084）即司马光六十六岁时，全书写成。修书时间前后共用了十九年。

司马光编写《通鉴》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他自选助手数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但总持大纲、笔削取舍、核实材料、修润文字，都是他亲自主持，自己动手。此书的史事撰述有源有本，清楚明晰，史迹有根有据，文字优美，写战争则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写人物则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把一千三百多年纷错烦杂、分合难治的史事，按年、按月、按日，一丝不苟、一年不乱的记述下来，这部著作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是不能写

成的，因此司马光在《进通鉴表》中所说的“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当是实情。

《通鉴》写成后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十月初四日，在杭州镂板，是书成后的第一次刻板，世称元祐本，或杭州本，这就是《通鉴》的祖本。其后，覆刻者不止一家，如果不论其支派，只论其单传，则第一传即为绍兴二年（1132）七月初一日绍兴府余姚县刊板、绍兴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毕工进呈之本。此本是按元祐本翻刻，世称绍兴重刊本。今祖本已不可得，此绍兴重刊本实已为《通鉴》现存最早板本。1919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辑印《四部丛刊》时，《通鉴》被收入其初编，就是用绍兴重刊本影印。《丛刊》初编共收辑典籍323种，其中用宋本影印者仅有39种，《通鉴》就是39种之一。影印分装订为80册，精美异常，书中有清朝著名藏书家卢文弨和汪士钟印章，更增添这一板本的价值。

司马光编《通鉴》的目的，就是要“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要通过叙述历史上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以总结统治经验，为“当今”借鉴，因此得到宋神宗的赏识，认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之为《资治通鉴》。其实过去的史事，在今天也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毛主席就曾将《通鉴》读过十七遍，“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他读《通鉴》真是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他说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见郭金荣《读破了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

今岳麓书社将此书原文出版，用简体字横排，使用新式标点，不加胡三省注释，比加印胡注和考异，份量可大大减缩，极便阅读和插架。何况又用目前留存的最好板本做为底本，实为有识之举，特为之序。

刘乃和

1990年4月写于北京师大

序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以同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二人。一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一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成长时期产生的两部巨著，它们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同时开《二十四史》之先河，成为纪传体史书的杰出的代表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时期出现的浩大的史学工程之一，成为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往往被用来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一般读者，甚至历史学专业工作者都难以遍读；即使是与《资治通鉴》内容相关的“十七史”，尽读亦属不易。《资治通鉴》就不一样了，不仅卷帙少得多，而且全书贯穿一气，是一般读者能够通读下来的。岳麓书社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要和专业工作者研究的方便，以涵芬楼影印宋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即通常所称“乙十一行本”白文标点出版，与现今中华书局胡注点校本并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出版者嘱我为《资治通鉴》白文标点本写一篇序，意在对这部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便于读者的阅读。我是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

一 《资治通鉴》的体裁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凡 294 卷，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公元前 403 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 959 年），记述了其间 1362 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 30 卷，与之相

辅而行：《目录》相当于大事年表，《考异》是说明史料取舍之故。

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记事，易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春秋》、《左传》，自东汉荀悦著《汉记》以后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而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编年类”史书共有41家、48部、947卷。实际数字，当不止于此。这些书大多早已亡佚，而且一般也都是记一个时期或一个皇朝的史事，其中以今存的《汉记》和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最为知名。值得提出的是，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上是作出了不小贡献的；这些通史撰述在表现形式上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传记体、文征体等，从而把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萧颖士、马总、姚康都曾撰有编年体通史著作。萧书“起汉元年，迄隋义宁”，凡百篇（《新唐书·萧颖士传》）。马书名《通历》，起自“太古”，迄于隋朝，凡10卷。姚书称《统史》，“上自开辟，下迄隋朝”，共300卷，是一部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著作（见《旧唐书·宣宗纪》）。萧、姚二书已佚，马书佚前3卷，存后7卷。这些事实说明，《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巨制的产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总结历史上的通史撰述成就时指出：“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潏《大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文史通义·释通》）《通典》和《大和通选》出自唐代，《资治通鉴》和《通志》出自宋代。章学诚从唐宋时期通史撰述大发展的史学演进趋势，高度评价了《资治通鉴》在编年体史书以至整个史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这个见解是十分中肯的。

二 《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所记千馀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

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司马光自述本书的主旨是：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上〈资治通鉴〉表》）

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光对撰述《资治通鉴》在内容上和目的上的确定。在内容上，他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这样的大事，即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在目的上，是要发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的众多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记述。这固然是本书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元初史家马端临深得其旨，他指出：“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文献通考·序》）他说的“详于理乱兴衰”，这是中肯地指出了《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特色；他说的“著述自有体要”，这是强调了不同的史书体裁自有其不同的任务。朱熹认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这个形象的比喻，一则说明司马光的书在内容上的重要，再则也说明它易于理解，不难接受。后人曾批评《资治通鉴》“不载文人”，顾炎武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日知录》卷26“通鉴不载文人”条）他们的这些评论，对于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这部巨著的主要内容，是有启发的。

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一书命名并作序，指出：“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这一段话，最能反映当时最高统治者对《资治通鉴》内容和目的的概括。这

个概括，跟司马光在上书表中所表达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初衷是一致的。他们的这些看法，清楚地表明了这部书的性质和它对当时政治统治的参与作用。但是，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它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往往是当时的人们甚至包括作者自己在内都难以预料的。约当《资治通鉴》问世6个世纪后，王夫之对它的内容和社会作用的评论，就深刻得多、广泛得多了。他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写道：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在王夫之看来，《资治通鉴》虽然重在讲“资治”，但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已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了，其中不乏辩证的因素。同时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个人修养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已远远不止是最高统治者的读物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了。他的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史学遗产在价值观念上的变化。

当然，时移世易，尔今，历史的内容和史学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今天的读者对于“资”“治”“通”“鉴”的认识，已不应停留在王夫之的认识水平上了。我们今天来读《资治通鉴》，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它所记述的那一部分历史，去认识历史上的史学家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历史的，并从中判断、抉择我们对于前人在认识历史上的继承与超越之所在，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

三 《资治通鉴》的文采

中国史家有讲求文采的优良传统,《资治通鉴》在中国古代的以文采见长的史书中又是属于上乘的著作。所以有人认为:“《通鉴》不仅是历史书,还可以当作文章读。”(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我要提到曾国藩在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稍更其类,增删篇目,纂成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这是清末民初年间影响颇大的一部古文读本。《杂钞》于“叙记类”主要选录《左传》、《资治通鉴》两书。所选录的《资治通鉴》11首是:赤壁之战、曹爽之难、诸葛恪之难、谢玄淝水破秦之战、刘裕伐南燕之役、韦睿救钟离之役、高欢沙苑之战、宇文泰伐北邙之战、韦孝宽之守玉壁、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裴度李愬平蔡之役等。这些,大多是记战争,写若干重大的历史场面,也涉及到不少历史人物。曾国藩在本书《序例》中说:“叙记类,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縢》、《顾命》;《左传》记大战、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他说的记事的“事”,即是史事。同《古文辞类纂》相比,《杂钞》在选篇的标准上,已不仅仅限于古文辞,但古文辞无疑仍是其选篇的标准之一。《杂钞》所选《资治通鉴》的这些段落,确是它在文字表述上的精采之处。记人,如亲见其人;写事,如身临其境;勾勒场面,如读历史画卷:都能给人一种史学审美的感受。

梁启超论史家四长而讲到史才时,用“飞动”一词盛赞《资治通鉴》的文采:“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就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所谓史笔“飞动”,就是史家力图写出运动着的历史。

曾国藩的《杂钞》和梁启超的评论,反映了近代以来人们对

《资治通鉴》在文采上的成就的重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资治通鉴》问世 900 余年来，始终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它的非凡的文采是其获得如此巨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今出版的史书，能够写出如同《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这样具有文采的著作，实属罕见。翦伯赞先生在 60 年代初曾撰《内蒙访古》一文，一时间，轰动当时的史坛和文坛；但象这样的论著，近几十年来并不多见。

四 《资治通鉴》的价值

《资治通鉴》的价值，不止表现在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内容的宏富和文采的优长等方面，尽管它在这几个方面都属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上品。

《资治通鉴》的价值，更表现在它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取材于历代正史，但又远远不限于此。司马光述其著述经过，其中有一段话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摭幽隐，校计毫厘。”这说明司马光于史料的蒐集、参考极其广泛而细致，既“穷竭所有”，又“校计毫厘”。南宋高似孙《史略》一书，列举《资治通鉴》引书 226 种，据清人统计则达 322 种之多，而其中许多书早已不存，赖《资治通鉴》有所征引而得以保存若干佚文。这说明它在历史资料的摄取的丰富性上，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凡遇有歧异、抵牾的记载，都在经过认真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其所采择的根据，同时又保存异说，使后人得知其所以然。这些，主要集中在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而撰成的《考异》30 卷中。司马光的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诚如顾炎武所说：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日知录》卷 19 “著书之难”条）

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这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极好的概括。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其重要者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等。近代以来，关于《资治通鉴》及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专门之学，近人张须著有《通鉴学》一书，可窥一斑。1984年和1986年，分别是《资治通鉴》成书和司马光去世的900周年纪念。其间，我国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开展。可见《资治通鉴》之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至今不衰。

《资治通鉴》一书，自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始撰，至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成书，历时19年。其间，先为丛目，再作长编，最后删为定稿。司马光说他的精力“尽于此书”，可以想见撰述之艰难。《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与价值，除了司马光本人的种种因素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三位助手刘恕、范祖禹、刘攽。他们根据“丛目”的要求分别撰出反映各个时期史事的“长编”，为司马光最后删订成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刘恕、范祖禹、刘攽皆极当时史才之妙选，都为《资治通鉴》的撰述倾注了心血。《资治通鉴》成为一部辉煌的巨著，是史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然，《资治通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之列举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对其中“小有抵牾，亦必明注其故”者（卷47《史部·编年类》）；又如顾炎武亦曾指出《资治通鉴》之改动前史也偶有不妥之处（《日知录》卷26“通鉴”条）；再如明末清初严衍等所撰《资治通鉴补正》一书，以有关正史与《资治通鉴》所采者作比较，对其讹误，予以刊正；近人还有指出《资治通鉴》在纪年上的不够周全之处（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应当指出来的。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资治通鉴》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第一，《资治通鉴》同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史书一样，它是以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历史的，这固然是时代和阶级对它的作者

的局限，不可苛求，但指出这一点仍然是必要的。第二，《资治通鉴》作为封建时代正宗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它在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总的趋向上是倾向于保守的。不论是以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去跟司马迁相比，还是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司马光去跟王安石相比，都是如此。这种保守的倾向，主要反映在《资治通鉴》的史论“臣光曰”中。如《资治通鉴》开篇所记的第一件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实上，是魏、赵、韩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在这个记载之下，司马光写下了本书的第一篇史论“臣光曰”，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他批驳那种“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的看法，“是大不然”，认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他进而提出对于战国时期总的历史形势的看法，就是：“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烂几尽，岂不哀哉！”司马光开宗明义即以纪纲、名分来规范历史，解释、评价历史，把历史演进、社会秩序一概归之于“礼”，又把天子视为“礼”的执掌者等等。在距离战国时期一千多年后，他还这样看待那时的历史变化和政治形势，实在是太保守了！这跟他的前辈们如司马迁、杜佑、柳宗元等之以“势”与“理”来说明历史的进程相比，也相去太远了！对于《资治通鉴》所记的第一件事和司马光所写的第一篇史论，胡三省在为其作注时，是一语道破了的。他认为：“《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当然，《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也不乏精采之笔，不无真知灼见，这要作具体分析，不应作绝对的看待。

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司马光所撰的另一部历史著作《稽古录》。这部只有20卷的编年体史书，部帙上约当《资治通鉴》的十五分之一，上起远古，下迄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其下限距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成书表进仅18年。曾有一些论者认为，《稽古录》是《资治通鉴》的缩写本，这是一种误解（司马光确有《资治通鉴》缩写本，即《资治通鉴

举要历》80卷，因刊布未广，已佚）。从司马光的《进〈稽古录〉表》来看，此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其撰述顺序是：“三晋开国，迄于显德之末”，名曰《历年图》；“自六合为宋，接乎熙宁之始元”，名曰《百官表》，亦称《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而上，乃抄撮旧史而成。《稽古录》跟《资治通鉴》相比，除了部帙上的悬殊而外，还有两个不同之处：一是《稽古录》包含的上限和下限都超出了《资治通鉴》的范围，尤其是《百官表》这一部分，简述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百余年史事，反映了司马光对本朝史的一些看法，是《资治通鉴》所不能代替的。二是《稽古录》的史论即“臣光曰”，一般不是就一人一事而发，而是对某个皇朝历史之得失盛衰的总结，可与《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互为补充。因此，阅读《资治通鉴》，最好能以《稽古录》相对照、相比较。是书，近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各有点校本行世，足资参阅。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晚年官至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宋史》本传称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实，王安石变法的进取精神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历史经验的冷静思考，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今天的读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它，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仍然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智慧和可贵的现实教益。

瞿 林 东

1989年7月18日记于

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资治通鉴序 御制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汉司马迁铢石室金匱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暇，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史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牒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馀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第一册目录

卷第一	周纪一	(1)
卷第二	周纪二	(11)
卷第三	周纪三	(22)
卷第四	周纪四	(32)
卷第五	周纪五	(44)
卷第六	秦纪一	(56)
卷第七	秦纪二	(69)
卷第八	秦纪三	(81)
卷第九	汉纪一	(93)
卷第十	汉纪二	(103)
卷第十一	汉纪三	(113)
卷第十二	汉纪四	(124)
卷第十三	汉纪五	(137)
卷第十四	汉纪六	(149)
卷第十五	汉纪七	(159)
卷第十六	汉纪八	(170)
卷第十七	汉纪九	(183)
卷第十八	汉纪十	(194)
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	(206)
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	(218)
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	(230)
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	(243)
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	(254)
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	(264)
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276)
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	(288)
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	(297)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307)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318)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330)
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	(343)
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355)
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363)
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373)
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383)
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395)
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406)
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十	(419)
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431)
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	(444)
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	(457)
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471)
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483)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496)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509)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520)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532)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543)
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555)
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568)
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582)
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596)
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609)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621)
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633)
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645)
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657)
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670)
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682)
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	(695)
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708)
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721)
卷第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734)
卷第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746)